

绿色变革视角下的 当代生态文化理论研究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ulture Theories from a
Perspective of Green Change

郇庆治 等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最终成果
(课题批准号: 12AZD07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资助出版

绿色变革视角下的 当代生态文化理论研究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ulture Theories from a
Perspective of Green Change

郇庆治 等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当代生态文化理论研究/郇庆治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 - 7 - 301 - 30156 - 2

I. ①绿… II. ①郇… III. ①文化生态学—理论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90971 号

- 书 名** 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当代生态文化理论研究
LÜSE BIANGE SHIJIAO XIA DE DANGDAI SHENGTAI
WENHUA LILUN YANJIU
- 著作责任者** 郇庆治 等著
- 责任编辑** 闵艳芸
-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30156 - 2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minyanyun@163.com
-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0673
- 印 刷 者**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36.25 印张 612 千字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9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 录

导言	/ 001
第1章 环境哲学	/ 020
第2章 深生态学	/ 052
第3章 生态美学	/ 083
第4章 生态自治主义	/ 113
第5章 生态文明理论	/ 149
第6章 生态马克思主义	/ 185
第7章 绿色工联主义	/ 220
第8章 生态女性主义	/ 252
第9章 社会生态学	/ 286
第10章 环境新社会运动理论	/ 316
第11章 可持续发展理论	/ 350
第12章 生态现代化理论	/ 391
第13章 环境公民理论	/ 429
第14章 绿色国家理论	/ 468
第15章 全球环境治理理论	/ 503
主要参考文献	/ 542
后记	/ 574

导 言

“生态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可以界定为人类社会不同于或超越了现代工业文明及其文化意涵的、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合生态性制度、文明与文化体系及其元素,而就其现实相关性来说,尤其是指对不断全球化扩展着的现代工业/城市文明的生态化超越的智力展现及其实践成果。依此,我们可以从“绿色文化升华”(新型生态文明的精神建构)和“绿色变革文化”(现存工业文明的精神解构)相统一的维度,来把握与界定“生态文化理论”^①,并将其大致理解为通常所指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学科)的代称。为了简化讨论,在本书中笔者将“生态文化理论”限定为“深绿”意义上的生态哲学与伦理、深生态学、生态审美、生态自治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红绿”意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与环境新社会运动理论,和“浅绿”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环境公民(权)理论、绿色国家理论与全球环境治理理论等主要代表性流派,并着重分析这些国内外生态文化理论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了关于当代人类社会绿色变革的合理想象或实践路径。

一、“深绿”生态文化理论及学术流派

“深绿”意义上的生态哲学与伦理、深生态学、生态美学、生态自治主义和生态文明理论,是以个体生态价值观的生态(物)中心主义转变为核心/基点的代表性生态文化理论,其基本特点是坚持认为,个体价值观层面上的生态中心

^① 余谋昌:《生态文化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文化新世纪:生态文化的理论阐释》,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主义改变,即明确承认和充分尊重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构成要素的独特价值,是所有绿色变革得以实现的根本或前提。

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学严格地说分属于哲学和伦理学两个不同的学科分支。前者是要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回答人类社会及其自身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作用以及适当的生存与生活方式(即“我们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而后者是关于如何对待生态价值、如何调节人与生物群落之间和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伦理学说(道德规范)。但是,无论就它们形成发展的大致历程,还是就其所致力于探讨的核心议题(如何在根本性消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同时,明确承认与充分尊重非人类自然存在、生态和物种的内在价值及其存续需要)来说,“生态(环境)哲学”和“生态(环境)伦理学”都是大致可以互换使用的概念。尽管其思想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边沁的扩展的“道德共同体”和赫胥黎的人与自然间亲和伦理,甚至中国古代“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思想,但学科形态的生态哲学/伦理学大约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欧美国家,标志性著述是法国哲学家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的“生命伦理”和英国环境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大地伦理”。70年代及其以后,美国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的《哲学走向原野》《环境伦理学:自然界的价值和人对自然的责任》等论著,将其确立为一门独立的新兴交叉学科。90年代后,中国学者关于生态哲学和伦理的著作也大量出现,比如刘湘溶、李春秋和叶平的同名著作《生态伦理学》以及余谋昌的《惩罚中的觉醒:走向生态伦理学》等。

当代生态哲学和伦理的焦点性议题,无疑是提供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合生态关系一般构型,以及相应的人类个体或群体的生态道德规范,即当代人类社会何以成为生态化的社会。但进入新世纪以来,至少就国内的研究进展来看^①,生态哲学与伦理的突破性成果(类似90年代初关于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学术争论)似乎不是太多。比如,余谋昌所倡导的创建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伦理学派的努力^②,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效,而中国环境哲

① 余保玲:“环境伦理学研究综述”,《当代社科视野》2009年第9期,第28—32页;刘湘宁:“生态伦理学研究综述”,《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98—100页;刘芳:“当代环境伦理学研究综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15—21页;章和杰:“近年来生态哲学主要观点综述”,《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5期,第45—48页。

② 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分别于2004年和2012年在南京市和黄山市举办了“环境伦理学国际研讨会”,主题分别是“创建中国环境伦理学派”和“生态文明:国际视野与中国行动”,代表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准,但总体而言,我们与欧美学者之间仍缺乏平等的、实质性的学术对话。

学研究会举办的关于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生态社会主义等的系列专题讨论^①,也缺乏引领性的独创之见。

深生态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激进的生态哲学与伦理理论流派。^②它是由挪威哲学家、生态学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1973年最早提出的^③,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生态哲学与伦理学说。奈斯认为,深生态学的两个“终极性规范”是“同时承认人类和自然界其他类属的个体潜能自我实现”和“主张一种以生物为中心的平等”或“生物(态)中心主义”。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一种使我们可以体验到与其他存在物等同的活生生感觉的方法,因为只要我们能感觉中容纳其他自然存在,也就不需要专门以道德劝告显示对自然的关心。依据这一思路,美国学者沃瑞克·福克斯(Warwick Fox)在《走向超越个体生态学:发展环境主义的新基础》(1990)中,论证了“自我更新存在”的内在价值,而比尔·德维尔(Bill Devall)和乔治·塞森斯(George Sessions)则在《深生态学:充分尊重自然的生活》(1985)和《手段简单而意义丰富:实践深生态学》(1988)中,详尽阐述了深生态学的一种宇宙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即“超越个体生态学”。超越个体生态学方法,既是宇宙论的,也是心理学的,因为它始于一个特殊的世界或宇宙图画,即我们事实上是展开的生命之树上的树叶,然后扩展到与所有现象的认同。

具有强烈非理性或直觉方法论色彩的深生态学,为我们探寻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指出了一种既原始又崭新的路径,即从超越自然转向回归自然、从外向性征服转向内心省悟。但部分是由于对现代文明的深层抵触或质疑态度,深生态学往往很难得到“红绿”或“浅绿”生态文化理论流派的接受或认同,就连奈斯本人也称之为“面向22世纪的生态学”。国内学者中,杨通进和雷毅更为关注的是深生态学的一般哲学理论渊源和科学基础,而范冬萍和张华夏、聂耀东和彭新武等更关注的是深生态学 with 复杂性科学之间的联系,还有

① 中国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环境伦理学研究会于2007年联合主办的学术年会曾发布了代表会议共识的倡导建设生态文明的“鹭峰宣言”,尽管该宣言并未产生所期望的社会与政策影响,却颇为罕见地展示了学术团体引领与促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志向。

② John Dryzek and David Schlosberg (eds.), *Debating the Earth: Th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Rea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49.

③ Arne Naess,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 ecology movement: A summary”, *Inquiry* 16 (1973), pp. 35-42. 他在该文中首次提出了深生态学的“七信条”,具体包括:拒绝人类环境而转向一种关系性整体的映像,原则上的生物平等主义,多样性和共生原则,反等级立场,与污染和资源枯竭作斗争,复杂性而非复杂化,地方自治与分散化。

的学者像朱晓鹏、余正荣试图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寻找深生态学的理论渊源。^①总的来说,纯粹或极端意义上的深生态学——信奉并追求人与自然间的“物我两忘”“浑然一体”,恐难以成为当代社会中普通民众的一种普遍性/持久性的“真情实感”(作为某些个体的某种情景下的感悟是能够存在的),也就不容易实现一种向生态中心主义价值与伦理的转化甚或替代。

生态审美或生态美学集中体现了人类对于自然界价值(广义上的)感知的另一种维度,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善”之上的更高视野与境界——德国著名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甚至从生态“新感性”中解读出了一种强烈的解放或革命意蕴。^②因而,它既是美学理论对当代人类社会生态环境危机现实主动回应的一种努力,也是传统美学经过数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之后的一种自然本体化意义上的反拨。生态(环境)美学在欧美国家也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哲学美学分支学科,大致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它之前,分析传统下的美学更多关注的是艺术哲学,而生态(环境)美学转向了对自然环境的审美。随着其不断发展,生态(环境)审美已经发展到包括人工或人化环境,以及这些环境中的存在物,并导致了所谓的“日常生活美学”。因而,进入21世纪的生态(环境)美学,已经涵盖了艺术之外的几乎所有事物的审美重要性的研究。^③

国内最早的生态美学著述是李欣复1994年发表在《南京社会科学》上的“论生态美学”。进入新世纪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和《江汉大学学报》(2005)等,也先后发表了相关专题性论文。2001年10月和2003年11月,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生态美学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同时,由曾繁仁领导的山东大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研究中心,不仅从事了许多重大课题的研究,而且举办了一系列全国性和国际性的专题学术会议(依托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比如2005年主办的“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研讨会、2009年主办的“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和2012年主办的“过程哲学与生态美学国际研讨会”。在研究内容上,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大

① 薛勇民、王继创:“走向深层的环境伦理研究”,《晋中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43—46页;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郇庆治:《欧洲绿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219页。

② Herbert Marcuse,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③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EP),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environmental-aesthetics>, 31 July 2012.

多数人主张研究广义上的地球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或者分为狭义和广义的生态美学)、生态美学的哲学渊源(得到广泛认同的是曾繁仁提出的生态存在论是生态美学哲学基础的观点^①)、中国古代智慧中的生态美学(许多学者致力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美学资源)等方面。^②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生态美学研究尚处在一个起步阶段,更多地关注确立其与主流美学和文艺批评理论的适当边界,而缺乏更多生态(主义)视角下的社会文化理论思考与实践批评。

生态自治主义是一种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价值观取向下的社会政治理论,主张在追求尊重非人类世界整体性的同时,建立保证人全面和彼此间实现的、合乎人性规模的、合作性的社区(共同体),而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准是人类共同体适应生态系统的程度和人类全面需要实现的程度。^③其中,生物区域(系统)原则和寺院式生活准则,是其核心性方面或代表性范式;前者强调生态系统(区域)完整性的优先性,比如美国的科克帕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 Sale)和皮特·伯格(Peter Berg)与雷蒙·达斯曼(Raymond Dasmann),而后者强调人类社区生活必需品满足的自足性,比如德国的鲁道夫·巴罗(Budolf Bahro)和英国的爱德华·戈德史密斯(Edward Goldsmith)等。^④需要强调的是,几乎所有的“深绿”或生态自治主义者,都把工业社会(大城市)的消解与小规模社区(家庭)的某种程度复兴,视为未来绿色社会的首要表征(远离目前大规模的大众消费社会),而正是这一点遭到了包括大部分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在内的“红绿”人士——尤其是像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⑤这样的新一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和无法实现的。

作为一种包含着强烈实践意蕴的理论,生态自治主义不仅在欧美国家显得有些“曲高和寡”——各种形式的“生态公社(合作社)”试验只具有非常有限

① 曾繁仁:《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 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朱亚辉:“当今美学界的热门话题:国内生态美学研究综述”,《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221—228页;刘精科:“国内生态美学研究综述”,《中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27—30页。

③ Jim Dodge, “Living by life: Some bioreg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CoEvolution Quarterly* 32 (1981), pp. 6-12.

④ 王春荣:“生态自治主义及其哲学基础”,《行政与法》2006年第1期,第66—69页;郇庆治:《欧洲绿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239页。

⑤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433页。

的应用与推广价值,而且在中国,即便自称为生态(物)中心主义哲学与伦理的热情拥戴者,也大都不接受这样一种极端化的未来社会思路。然而,在相当程度上作为现实工业文明(社会)的对立面,生态自治主义的未来绿色社会“隐喻”(众生平等、地方自治、分散化^①)及其实现路径,仍有着不容置疑的启迪或兆示意义。

生态文明理论,尤其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学者在中国背景/语境下所提出、阐发的一种较为激进的生态社会政治理论。一方面,国外学者对“生态文明”范畴或理论的阐述并不特别多,唯一明显的例外可能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小约翰·柯布(John Cobb)等学者^②——他明确强调应该用一种新型的生态文明来取代目前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当然,鲁道夫·巴罗晚年也有着类似的看法)。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学者中的大多数更接近于一种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立场。也就是说,他们更关注的是社会制度的改变,而不是个体价值观的变革(萨拉·萨卡也许是其中少有的例外)。至于较早论述“可持续发展社会”概念的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等人,则根本算不上生态文明理论的拥立者。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对“生态文明”概念的阐释与论证,更多是为了从一种更高的政治视野来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与价值。比如,2006年前后较早阐述生态文明概念的张云飞和尹成勇等^③,一般来说,他们并不认为,中国目前的发展比西方国家更接近于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

也许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同时强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发展意识形态和个体价值革新意涵。^④也就是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成果如何,将同时取决于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层面上的实质性创新和社会主体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上的根本性革新(即“生态新人”的培育)。无论现实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必须呈现为一种政治折中性的大众化运动(实践)，“深绿”意义

① John Dryzek and David Schlosberg (eds.), *Debating the Earth: Th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Rea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49.

② 小约翰·柯布:“文明与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6期,第18—22页。

③ 孙亚忠、张杰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述评”,《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19—22页;葛悦华:“关于生态文明及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综述”,《理论与现代化》2008年第4期,第122—126页;是丽娜和王国聘,“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述评”,《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第11—13页。

④ 郇庆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种更激进的绿色选择?”载《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7—282页。

上的生态文明理论,理应具有一种强烈的生态中心主义(或反人类中心主义)意涵。^①换句话说,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当然应该是“红绿”的,但必须首先是“深绿”的。

二、“红绿”生态文化理论及学术流派

“红绿”意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与环境新社会运动理论,是以社会制度及其支持性文化理念的生态化转变为核心/基点的代表性生态文化理论,其基本特点是坚持认为,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支撑性政治与文化是当代生态环境难题的深层成因和根本性解决思路,即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类自身的问题。^②

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当代生态环境难题所做的理论阐释,并构成几乎所有“绿色左翼”政治流派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虽然从词源学上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不容置疑的差别,虽然在现实中“北美学者领导生态马克思主义、欧洲学者引领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难否认的客观现象,但就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与基本内涵而言,我们却很难将其作为两个独立的学术流派来看待。二者的差异在于,“生态马克思主义”更加侧重马克思及其他经典学者相关著述的理论来源及其方法论意义,而“生态社会主义”更加强调一种未来绿色社会制度的设计及其战略,比如詹姆斯·杰克逊(James Jackson)和戴维·佩珀(David Pepper)分别所做的界定。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主要是它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发展的结果,并且可大致划分为以90年代初为界的前后两个阶段。而且严格说来,尽管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似乎依然缺乏充足的理由断定,21世纪以来的生态社会主义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近年来,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方面较为重要的著述包括:约翰·福斯特(John B. Foster)等出版的新著《生态断裂:资本主义对地球战争》,继续着

① 郇庆治、李宏伟、林震:《生态文明建设十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郇庆治、高兴武、仲亚东:《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② 郇庆治:“进入21世纪以来的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第127—139页。

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严苛批判；^①英国“绿色左翼”理论家和活动家德里克·沃尔(Derek Wall)2010年出版的新著《绿色左翼的兴起：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这是他继2005年的《巴比伦及其以后：反全球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和激进的绿色运动的经济学》之后的又一力作；萨拉·萨卡(Saral Sarkar)与布鲁诺·科恩(Bruno Kern)合撰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堕落？——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2008)和英国“绿色左翼”的“海德科恩生态社会主义宣言”(2008)等。国内近年出版了许多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著作，比如陈学明的《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2012)、康瑞华的《批判、构建、启思：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2011)、王雨辰的《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09)、曾文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刘仁胜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2007)、徐艳梅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等等。^② 这些成果集中体现了我国学者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种偏重或偏爱，但就总体水平而言，仍没有摆脱“译介”“诠释”和“非批判性”的特征，不仅与欧美学者相比有着显著的方法论差异或“差距”，而且还存在着明显的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现实相脱离或脱节的现象。

绿色工联主义或生态工联主义主要是用来描述绿色基尔特或可持续贸易运动的政治理论概念。大致而言，它希望达成工会及其工联主义传统比如直接行动和工作场所民主，与绿色运动及其实践比如公平贸易、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上的政治合作，但却未必能够接受后者的社会激进变革要求与目标。但是，绿色工联主义作为一种“红绿”政治理论支派的意义在于，以杰夫·尚茨(Jeff Shantz)和格雷厄姆·珀切斯(Graham Purchase)等为代表的加拿大学者，致力于实现“绿色劳工运动”和“生态无政府运动”(生态区域自治)在政治方法论与实践上的融合或结合，而劳丽·阿德金(Laurie E. Adkin)等学者，则更加关注在反资本主义总体实践中的“红绿”(左翼劳工运动与生态新社会运动)联盟。概括地说，“绿色工联主义”的理论要点包括如下三个：一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不是经济规模、工业制度、技术或者劳工团结等具体因素。二是未来绿色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分散和非工业的“社

^① 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 and Richard York, *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② 刘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综述”，《才智》2012年第2期，第223—224页；张笑扬：“近30年来国内学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综述”，《鄱阳湖学刊》2011年第3期，第43—50页。

区”社会。而如果确是这样的话,服务于基层需要的非营利性工业及其劳动组织,就应理解为一种面向未来的而不是需要废除的因素。三是在走向“生态无政府社会”的变革进程中,“劳工运动”和“生态运动”理应成为相互尊重与支持的伙伴或政治联盟。

在“绿色工联主义”研究方面,杰夫·尚茨出版了他的新著《绿色工联主义:一种替代性红绿观点》^①,此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丹·雅科波维奇(Dan Jakopovich)的两篇文章。一篇题为“团结起来赢得胜利:劳工环境联盟”,发表于《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2009年第2期;另一篇题为“绿色工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发表于《综合/革新》2007年春季号(总43期)。毋庸讳言,绿色工联主义即使在欧美绿色运动大家庭中也不是一个主流性的派别,而颇为有趣的是,即使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劳工团体与环境抗争活动的政治联合也不多见,而这在2011年1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首届“中欧环境社会运动比较”国际研讨会上成为一个受关注的话题。^②

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试图将“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相结合的社会政治理论与运动。其基本理念是,女性在现代家庭、社会中的从属性和受压迫地位,与自然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归根结底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导致或促动的严重不平等的经济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观念。而对于当代生态女性主义者而言,她(他)们更倾向于把当今世界描绘成一个由“资本主义父权制”主导的、由“南方、女性和自然”组成另一方的“三位一体”。玛丽·梅勒(Marry Mellor)、玛丽亚·麦斯(Maria Mies)、瓦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艾瑞尔·萨勒(Ariel Salleh)等,是这一理论的代表性学者。

近年来在“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著作方面,主要有尼亚姆·穆尔(Niamh Moore)的《变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2013)、潘迪(S. Pandey)的《女性主义的出现与世界重构》(2011)、格里塔·嘎德(Greta Gard)的《生态女性主义:妇女、动物和自然》(2010)、艾瑞尔·萨勒主编的《生态足量与全球正义:女性论政治生态学》(2009)、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当物种相遇时》(2008)、玛蒂·黑尔(Marti Kheel)的《自然伦理:一种生态女性主义观点》(2008)、巴巴

^① Jeff Shantz, *Green Syndicalism: An Alternative Red/Green Vision*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② 周珂主编:《中欧气候变化与社会生态运动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拉·库克(Barbara Cook)的《妇女论自然:女性主义视角》(2007)、卡塔琳娜·莱帕内(Katarina Leppanen)的《埃琳·瓦格纳的警钟:战争间歇期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2007)、玛丽·雷斯(Mary Ressa)的《拉丁美洲的生态女性主义:来自边缘妇女的声音》(2006)、洛伦·科德(Lorraine Code)的《生态思考:关于知识源泉的政治》(2006),等等。^①在国内研究方面,尽管人们对“生态女性主义”的关注有所增强^②,但系统的著述依然少见,代表性著作有吴琳的《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研究》(2012)、南宫梅芳的《生态女性主义》(2011)、袁玲红的《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形态研究》(2011)和杨海燕的《薇拉·凯瑟生态女性主义研究》(2006)等,而且,更多地呈现为一种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③,而不是一种社会与政治批判理论。

社会生态学作为一个“红绿”生态政治社会理论与运动流派,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默里·布克金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他于2006年夏的辞世也使这一理论的未来走向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布克金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逐步创建了这一哲学政治理论。《后稀缺时代的无政府主义》《走向一种生态社会》和《自由生态学》等,是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社会生态学的基本观点是,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植根于更为深层复杂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统治性的等级制政治与社会体制,而正是后者导致了现代社会对一种“增长或是死亡”哲学的无条件接受。在它看来,一方面,除了那些纯粹的自然灾难,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生态环境问题都有其经济、种族、文化和性别冲突的根源。默里·布克金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人类必须统治自然的观念直接起源于人对人统治的现实”。另一方面,抗拒或替代这样一种资本主义政治与社会体制,很难通过个体性行动比如道德性的消费合作实现,而必须借助于基于激进民主理念的更加深刻的伦理思考和集体行动。

近年来“社会生态学”研究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布克金逝世前后对他著述的进一步编辑出版及其相关评述,比如由埃里克·艾格拉德(Eirik Eiglad)编辑的《社会生态学与生态公社主义》(2007),二是布赖

① 郁庆治:“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论评”,《江汉论坛》2011年第1期,第133—139页。

② 王溪桥:“中国大陆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新西部》(理论版)2011年第8期,第108—110页;贾靓:“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综述”,《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53—57页;关春玲:“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25—30页。

③ 比如,这方面的著作还有王诺的《欧美生态批评:生态学研究概论》(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夏光武的《美国生态文学》(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和李美华的《英国生态文学》(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等。

恩·托卡(Brian Tokar)等新一代社会生态学家的新著述,比如戴维·赖特(David Wright)等编辑的《社会生态学:将我们的生态理解应用于我们的生活与星球》(2011)^①。但总起来看,我们很难找到像安德鲁·赖特(Andrew Light)1998年主编出版的《布克金之后的社会生态学》那样的围绕社会生态学理论本身的全面争论性作品。而且,无论从研究主题还是学术活动上,作为其大本营的佛蒙特“社会生态学研究所”似乎都在强化着与位于挪威的“选择性民主”研究中心及其杂志《公社主义:理性社会国际学报》的联系。在国内方面,最早的著作应是丁鸿富等著的《社会生态学》(1987),而最富成果的研究机构则是王国聘领导的南京林业大学社会生态学研究中心(江苏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许多博士生、硕士生以此为主题撰写学位论文,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等也开展了一些零散性研究。

环境新社会运动理论是用来描述和解释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欧美国家兴起的诸多新型社会运动形式的理论术语或流派。它的基本假设是,西方发达国家正随着非工业主导经济结构的出现而进入一个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后现代政治时代,而这些新型社会抗议/追求运动的兴起,不过是这种代际变化中的公众价值观与政治文化的具体体现。在实践层面上,它涵盖了所有的不同于传统的宗教团体运动和劳工运动等的新型社会运动形式,比如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少数民族权利运动、第三世界团结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区域自治/分离运动,等等。至少到80年代中后期,西方“新社会运动理论”及其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分支,而大多数新社会运动形式也正是从那时起开始了一个被普遍认为的重要转型时期。可以说,进入21世纪的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就是在这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背景下展开的。

从研究内容上说,笔者曾从国内政治动员、跨国政治动员、地方性政治动员、反全球化政治动员四个层面详细概括了“生态新社会运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理论与实践进展。而这方面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一是对世界各国环境运动的比较(个例)研究,二是对全球气候变化抗议与正义运动的研究,三是对环境运动相关议题领域的研究,四是对“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的研究。^②

^① David Wright, Catherine Camden-Pratt and Stuart Hill (eds.), *Social Ecology: Applying Ecological Understanding to Our Lives and Our Planet* (Stroud, England: Hawthorn Press, 2011).

^② 郁庆治:“新世纪以来的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载《当代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6—370页。

这方面最新出版的著作包括凯特·戴维斯(Kate Davies)的《美国环境健康运动的兴起》(2013)、戴维·施劳斯伯格(David Schlosberg)的《界定环境正义:理论、运动和自然》(2009)、蒂莫西·多伊尔(Timothy Doyle)的《多数与少数世界中的环境运动》(2004)^①,等等。就国内而言,学界对欧美新社会运动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新左翼运动”“新社会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等议题上^②,对狭义生态环境运动的阐述分析并不非常充分。

三、“浅绿”生态文化理论及学术流派

“浅绿”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环境公民理论、绿色国家理论与全球环境治理理论,是以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抑制或减缓为核心/基点的代表性生态文化理论,其基本特点是,主张在目前盛行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有效阻止生态环境难题的进一步蔓延与恶化,因而往往是“生态资本主义”的。^③

可持续发展是以1992年里约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为标志(可更早追溯到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的国际社会广泛确认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战略的通俗性代称。它的要义是如何通过发展观念与模式的革新,来克服人类正面临的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与资源困境,也就是实现一种可持续的发展;它最初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与生态可持续性(承认自然/生态极限),但随后逐渐扩展到如何创建一种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因而,可持续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国际社会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以来逐步形成的一种“环境或可持续发展全球共识”:一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① Kate Davies, *The Rise of the US Environmental Movement* (Lanham, M. 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 David Schlosberg, *Defin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ories, Movements and N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Timothy Doyl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Majority and Minority Worlds: A Global Perspectiv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刘颖:《新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反全球化运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陆海燕:《新社会运动与当代西方政治变革》,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奚广庆、王谨主编:《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岳世平:“当代西方环境运动述评”,《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6—9页;权伟太、王宏伟:“‘反全球化运动’的特征及其在‘9·11’事件后的发展”,《国际论坛》2003年第2期,第14—20页;赵林:“美国新左派运动研究述评”,《美国研究》1996年第2期,第40—58页。

^③ 郁庆治:“21世纪以来的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2期,第108—128页。

来抑制、最终逆转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以及其他全球性环境问题),维持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的生态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二是世界各国通过产品更新换代、工艺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构建一种低能耗物耗、较少生态环境损害的绿色经济。所谓“稳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就是对这种可持续绿色经济的主要表征。三是人类社会共同探寻一种超越现代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大众主义消费模式的适度消费、社会公平、生态正义的生存方式与生活风格。因而,可持续发展既可以在原则与战略的不同层面上来解读,也可以依据对生态可持续性、环境友好和经济增长的偏重而有激进和温和的区分。

而从过去 20 多年的回顾来看,尽管理论层面上的研讨包括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关系议题上的探讨仍在持续,并有着大量的著述出版^①,但无可否认的却是它在国内外不同维度上和不同政策层面上都存在着的巨大落实“赤字”^②,其中原因复杂且值得我们深思。

生态现代化理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联邦德国的马丁·耶内克(Martin Jänicke)和约瑟夫·休伯(Joseph Huber),荷兰的格特·斯帕加伦(Gert Spaargaren)、马藤·哈杰尔(Maarten Hajer)和阿瑟·摩尔(Arthur Mol),英国的阿尔伯特·威尔(Albert Weale)和约瑟夫·墨菲(Joseph Murphy)等共同提出。他们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不相容性的理论假定进行反思,并将关注的重点从环境问题的政策法律监管和事后处理,转向了如何实现环境问题的预防和通过市场手段克服环境问题,因而可称之为欧洲版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它一经提出,就迅速被相关国家政府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联盟等国际机构所接受,并得到了不太激进的环境非政府组织比如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自然基金等的支持。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创新之处是对人类当代社会面临的生态挑战做了另外一种阐释,强调市场经济竞争和有能力国家推动下的绿色革新可以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减少环境破坏,因而“环境”与“发展”之间可以呈现为一种兼得或共赢的共生性关系。生态现代化战略包括三个核心性构成要素:一是目标设定上强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并重的共赢;二是动力机制上强调“技术预防”或技术引领主义;三是运行机制上强调市场的优先性。

近年来“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上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

① 比如,我们在 Amazon 图书网站搜索“sustainable development”,得到的结果是 56 159 条。

② 郁庆治:“重聚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共识”,《鄱阳湖学刊》2012 年第 3 期,第 5—25 页;范春萍:“面对失控的世界 人类必须做出抉择”,《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 年第 2 期,第 1—9 页;冯冯娅:“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综述”,《现代哲学》1996 年第 3 期,第 106—108 页。